

认识论断代史研究的新起点

——《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读后

王 荫 庭

陈修斋先生主编的《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它的问世的确是欧洲哲学史研究中的可喜收获。凡是想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都要认真学习欧洲哲学史。但文化革命以前的十六七年,国内对欧洲哲学史的研究本身却是相当薄弱的。粉碎了“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十年,欧洲哲学史领域的科学研究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光是已经出版的通史教材和断代史论著就有十余种。《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乃是这一领域科学研究中的最新成就。它是断代史,也是认识论史,即是认识论史中的断代史研究。

陈修斋先生从四十年代以来一直从事欧洲哲学史的翻译、研究和教学工作。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翻译的、在我国学术界有广泛影响的六卷本《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中“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笛卡尔”、“孟德斯鸠”、“拉美特利”、“狄德罗”部分即由陈先生翻译或校订。198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和杨祖陶先生合著的《欧洲哲学史稿》。这是他们多年教学工作的结晶,出版后不久即被国家教委列为高等学校哲学类专业教材,随后又被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选定为自学考试用书。陈先生还是我国著名的莱布尼茨哲学专家,发表了许多篇关于莱布尼茨哲

学的学术论文,译校出版了莱布尼茨重要哲学著作多种,如《人类理智新论》、《单子论》、《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他还和曹棉之合作翻译了休谟的《自然宗教对话录》(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1978年以后,在他和杨祖陶先生共同指导下培养了好几批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其中十人的硕士学士论文都是专门研究霍布士、洛克、巴克莱、休谟、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马勒伯朗士的认识论思想的。所以,这本书的写作是在详细占有和具体分析材料的基础上经过多年反复探讨而后完成的。

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考察社会政治条件、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各种意识形态的一般特征对产生近代欧洲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制约作用以及欧洲经验论和唯理论从古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时代的萌芽、孕育和成长过程。第二章概述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各自发展和互相论战的逻辑进程和主要阶段及其主要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要旨。第三、四章分别就认识的对象和主体,认识的起源、途径和方法以及真理观等认识论主要问题,详细阐明两派代表人物在论争中所表露的主要观点及其演变过程。最后一章则简要论述两派对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派、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巨大影响,指出它们在哲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和理论功过,以及给我们提供的经验教训。总的看来,这本书的重心和精

华主要在第二、三、四章。或者说,和其他同类著作相比,它的最有特色的地方主要在中间三章。作者在“后记”中写道,该书“力图对一般教科书的框框有所突破”。那么,它在哪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它的主要特色是什么?我想,至少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要讨论近代经验论、唯理论哲学,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经验论?什么是唯理论?两者的根本区别是什么?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所谓唯理论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经验是靠不住的,反之,经验论则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

这些说法显然不符合哲学史的事实。因为“就一般意义的认识来说,无论是理性主义者还是经验主义者,都不否认人能通过感觉经验获得知识,也并不否认人能通过理性推理获得知识”。在他们看来,有些认识起源于经验,有些知识来自理性。例如洛克把反省看作感觉之外获得简单观念的另一来源。这意味着他肯定人的心灵具有非感觉的活动能力,尽管从反省得来的只是很小一部分简单观念,而且反省活动本身也是在通过对外物的感觉已获得许多观念作为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的。就是巴克莱也没有完全否认一切理性认识,而是在一定意义下仍然认为人可以获得关于自然法则的知识。休谟甚至肯定欧几里德所证明的真理始终是可靠的和自明的。同时,“经验派的哲学家也并不否认理性认识比感性认识可靠,如洛克就明确认为‘对于特殊存在物的感性知识’其‘明确性和可靠性’不如‘直觉的知识’和‘证明的知识’;休谟也认为‘关于事实’的知识的‘真理性’总不能与‘关于观念的关系’的知识即数学知识的真理性‘同样明确’的。而这些也并不仅仅是个别的例外,因为其实培根、霍布士,甚至巴克莱,也都在不同意义或不同程度上并不否认理性认识比感性认识更可靠。”^①相反,

以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理性派也明确认定,“在日常生活问题内……我们大部分的知识都来自感觉经验”,这些感觉经验并非“时时都在骗人”。^②

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国内外有的学者走向了相反的极端。他们干脆反对说经验论和唯理论是两个互相对立的独立派别。为了确认两派的存在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和驳倒上述两种对立的错误观点,关键在于提出一个正确区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科学标准。陈先生认为这个标准是:“凡认为对于事实的普遍必然性知识,……必须起源于感觉经验的,或者说,承认‘凡是在理智中的没有不先在感觉中’这一古老原则的,就是经验主义者;反之,凡认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不可能来自感觉经验而只能来自理性本身,从而也必然这样那样地否定了上述古老原则的,就是理性主义者。”这是区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主要标准甚至唯一标准,因为只有这一标准可以适用于一切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家而无一例外。同时,只要承认了这条原则,在其他问题上即使观点不同于一般经验主义者,也仍不失为基本立场属于经验论;反之则为唯理论一派。^③

关于近代欧洲经验论和唯理论的错误观念也表现在过去人们对它们的各种评价上。因此要在近代认识论史研究方面取得进展,清除这些错误观念同样是首要任务,正如建设新的大厦之前必须打地基,摈弃废物。在这些错误观念中最突出最严重而传播也最广泛的是对唯心主义哲学的片面的简单庸俗化的评价。这种错误观念体现在近代认识论领域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对唯心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全盘否定。据说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唯理论和经验论各有片面的真理只是就唯物的经验论和唯理论而言,至于唯心的经验论和唯理论那是连片面的真理也没有的。读了《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以后就会清楚地懂得,这种所谓“辩证唯物主义”的看法实在是既不辩证也不唯物的。就

拿休谟和莱布尼茨这两个唯心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来说吧。在欧洲哲学史上休谟第一个系统地分析了是否存在普遍必然的客观因果关系问题。他的分析确实表明,从感觉中得不到普遍必然性,按照原来那种经验主义的归纳法无法确立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因果规律,而象理性主义者那样撇开经验来肯定有这样的因果规律也只能是无根据的独断。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往整个认识论的基础,迫使后来的哲学家们另找基础,另谋出路,进而使认识论乃至整个哲学发展出另一片新天地。莱布尼茨是16—18世纪哲学逻辑思想的集大成者,尽管他的理性主义认识论是彻底唯心的,其中却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内容,决不是连片面的真理也没有。他提出的作为认识对象的单子实体具有能动性和异质性的思想在近代认识论的历史发展中就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列宁写道:“莱布尼茨通过神学而接近了物质和运动的不可分割的(并且是普遍的、绝对的)联系的原则。”④莱布尼茨关于认识主体的学说中特别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思想。他比培根、笛卡尔、斯宾诺莎等人高明的地方是不把理性认识同感觉这种混乱的知觉对立起来,而认为感觉中也有某种主动性。比方如果不是自觉地去“注意”自己的感觉,就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就不会产生清楚的“察觉”或“意识”。他在接受斯宾诺莎关于自由是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是按理性行事的合理思想的同时,还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斯宾诺莎否认偶然性的形而上学观点。在莱布尼茨看来,自由行为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这偶然并非不受决定,只是自由行为不是受他物决定,而是受自身本性所决定,不是受情欲决定,而是受理性决定,不是受不合理的情欲决定,而是受合理的情欲决定。他的两大推理原则(矛盾原则和充足理由原则)和两种真理(必然真理和关于事实的偶然真理)的理论,同样表现了试图把理性演绎法同经验归纳法,把必然性同偶然性、现实性同可能性以某种方式

结合起来的倾向。在这方面他也是狄德罗哲学和康德哲学的直接先驱。作为数理逻辑创始人,莱布尼茨在演绎过程(三段论)的形式化和精确化方面的巨大贡献,对后世认识论哲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更是众所公认的。

显然,用“唯心主义”这顶空头帽子来抹煞或贬低莱布尼茨、休谟、笛卡尔等人哲学思想的理论功绩和历史地位,乃是哲学史研究中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拒绝对丰富具体的历史现象作深入艰苦分析的一种表现。

陈先生一向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法论对欧洲哲学史研究的指导意义。他特别强调的方法论原则是:在具体阐明社会经济基础、阶级斗争状况对哲学思想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基础上,着重探索哲学思想本身的逻辑发展,以及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揭示哲学思想的辩证发展的规律性,即要把阶级分析、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正确地结合起来。多年来陈先生哲学史研究的重点的确在于探索哲学思想的逻辑发展。这同样充分表现在《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一书中。所以这本书的特色和成就,或者说它对一般教科书框框的突破,主要不在于阶级分析,而在于逻辑分析,不在于对社会的历史分析,而在于对思想的历史分析,即在于对哲学发展的外在历史形态和内在逻辑形态的统一性的探讨。

该书把16—18世纪经验派哲学和理性派哲学的发展各划分为三个彼此不同又互相衔接的独立阶段。经验派发展的三阶段是:创立阶段(培根、霍布士),发展阶段(洛克)和终结阶段(巴克莱、休谟)。理性派发展的三阶段是:创立阶段(笛卡尔),完备阶段(斯宾诺莎)和终结阶段(莱布尼茨)。它又把两派之间的对抗和论战划分为同样互相衔接逐步深入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原初阶段或序幕阶段,以霍布士、伽森狄与笛卡尔的辩难为主体,包括笛卡尔和培根之间的对

立以及斯宾诺莎的理性主义对经验主义的否定。论战的内容比较广泛,几乎涉及认识论的所有重大问题,缺点是深度不足,特别是没有抓住普遍必然性知识的来源这个当时认识论的根本问题,但为以后的论战作了准备。第二阶段为高潮阶段,主要包括洛克对笛卡尔主义的批驳和莱布尼茨对洛克经验主义的论战。论战的内容相对集中,主要集中在认识的起源和途径这个根本问题,尤其是集中在普遍必然性知识的来源和途径这个最紧要的问题上,而使论战引向深入,达到高潮。第三阶段为终结阶段,包括巴克莱和休谟对整个理性主义和唯物的经验主义的论战。论战的主要内容已经不再是普遍必然性知识来自感官经验抑或来自心灵、理性的问题,而是我们究竟有无能力获得普遍必然性知识的问题。这样就结束了原来意义下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论战。以哲学家们是否提出以及如何回答“人类是否能够与何以能够获得关于实际事物的普遍必然性知识?”这个问题为根据来划分16—18世纪欧洲认识论发展的各个阶段,这在我国在欧洲哲学史文献中可以说是一个创举。这样既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是经验论和理性论科学定义的合乎逻辑的展开,又同以后德国哲学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了。大家知道,康德整个“批判哲学”就是从探索所谓“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即“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真理由以成立的条件是什么?”开始的。

对这个时期两派哲学思想发展的逻辑分析,包括对整个经验论和唯理论各自的历史和互相对抗、论战的过程的宏观分析,特别是对两派哲学家们关于认识的对象、主体、方法、起源、途径和结果(真理性)各个具体问题的学说本身的内在矛盾以及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的微观分析,乃是该书最具特色的篇章,也是最见作者功力的地方。作者在考察了欧洲哲学发展到近代为什么必然使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以后指出,无论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作为一种认识

论的理论,原本是要探求认识的途径和方法。它们的创始人培根、笛卡尔都对人类理性的认识能力充满着无限的信心。但理性主义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因为在笛卡尔那里,理性思维、理性演绎虽然被他看作认识的基础和真理的标准,却必须以不经过理性思维和理性演绎而是借助直觉所获得的天赋观念这样非理性主义因素为前提。不过这时矛盾尚未明显、尖锐地暴露出来,因为笛卡尔只是把一些观念看成是天赋的。后来莱布尼茨明确宣布一切观念都是天赋的,所谓认识过程无非是感觉对潜存于心灵中的天赋观念的唤醒,这样一来便彻底否定了理性主义的上述基础,从而走向了它的反面,宣告了它的终结。而当休谟企图证明人类凭借理性思维或感觉经验都不可能认识客观世界和我们自身的实在本性和必然规律时,也就进一步从根本上破坏了两派认识论的理论基础。

整个近代英国经验论和大陆唯理论的发展是从培根的唯物主义和可知论开始,到休谟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结束。对于深藏在这一公认的历史过程背后的逻辑必然性,学者们一直在试图从不同角度加以揭示,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象这本书那样全面系统细致那样富有内容的分析,不仅在我国,而且据我所知,就是在俄文文献中,也可以说是具有科学价值的开创性的工作。它相当详细地阐明了这一历史时期认识论思想发展的辩证性,特别是在分析大量文献材料、首先是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就当时认识论一系列主要问题,不仅逐个指出了经验论或唯理论本身发展以及它们之间是怎样地既互相对立、斗争又彼此影响、渗透(这是最主要的方面),而且考察了从唯物主义哲学走向了富有内容的唯心主义复辟的过程中唯物的和辩证的思维因素是如何逐步积累的(可惜这方面未能得到充分展开)。过去人们总喜欢把哲学史中所谓“两军对战”简单地看成是唯心主义一方始终被唯物主义另一方打倒的连续过

程。该书彻底摒弃了这种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理论漫画化的庸俗做法,而试图用真正科学的态度具体说明这段哲学发展的极其复杂曲折的历史。

诚然,正如许多确有学术价值的科学著作一样,这本书也未能避免某些缺憾。例如,作者认为培根哲学的“最大弊病”在于它的朴素性,朴素性不是近代哲学的特征,而是文艺复兴时期乃至古希腊罗马时代哲学遗留下来的痕迹,而近代哲学原则上是以近代自然科学的总观点和基本原则为基础的。但遗憾的是,作者没有进一步概要地指出培根哲学的这种“朴素性”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它们又是怎样为霍布士哲学所克服的。所以总的看来该书对于培根哲学如何由于自身内在矛盾而过渡到霍布士哲学的这一逻辑过程的说明,就远不如对洛克哲学向巴克莱哲学进而向休谟哲学过渡所作的论述那样清楚具体那样令人信服。又如认识主体的能动性問題。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的认识论似乎完全是消极被动的反映论。作者不同意这个看法,而认为他们的反映论并不是那么消极被动:培根就相当重视作为科学实验的实践;霍布士也承认感觉中有主体的能动作用;洛克不仅谈到复杂观念形成时有主观能动性思想,就是在说明简单观念产生时也有主观能动性因素等等。尽管作者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过去这种片面的错误的观点,但是这些唯物主义者认识论中固有的主观能动性思想远未充分揭示出来。比方洛克在论述人类知识起源和发展时就特别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认识中的作用。他指出,这种主观能动性不仅表现在知觉、注意、记忆、分辨、把握、反省、抽象、组合、比较、判断等意识活动本身,而且表现在进行这些活动时人们有一种随意选择的能力。他还清楚地看到情感、意志之类的心理因素在认识过程中的重大意义。无论培根、霍布士还是洛克(当然笛卡尔、斯宾诺莎也不例外)在探讨现成的知识结构(或理论框架、思

维方式)对于促进特别是阻碍人们认识真理的作用问题上都有相当的贡献。在这方面康德哲学同样是有理论先辈的。再如作者在论述经验论和唯理论各主要代表人物哲学思想的演化时,由于问题分得细,结果出现了不少重复的地方。某些思想,如培根的“四假相论”、洛克的“两重经验说”、巴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等等,就反复讲过多次。虽然是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有时难以避免,但重复次数多了,毕竟会给人一种单调的印象。

《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一书,基本上是由陈先生的五位高足即邓晓芒、陈家琪、段德智、陈宣良和张传有同志在长时间共同讨论、取得大体一致意见基础上执笔写成的。不过陈先生在修改定稿时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却很不少。这一点,从目前全书文风没有明显差异来看,就是明证。陈先生曾说,改他人稿子有时不如自己写还省事些,其所以要走这条路,也有培养人材的意思。我以为这里真正体现了老一辈的学人对年轻的哲学史工作者的关怀和提携。希望晓芒等同志以现有的基础为起点,进一步深入研究,取得更有突破性的进展。

注释

① 《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第223、225、226、245、249页。

② 同上书第226、265、269页。

③ 同上书第225页。

④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27页。